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九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五六 ——  
(二〇〇三年十月六出版)

本期目录 (zk0310a)

【史海钩沉】一封原件已烧毁的毛泽东信件	徐景贤
【历史疑云】林彪命结“收妖”篇？	陈小雅
【史实辨析】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	张育明
【亡灵祭坛】寻找文革受难者	王友琴
【参考资料】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	德利克 (Arif Dirlik)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wz@cnd.org](mailto:hw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一封原件已烧毁的毛泽东信件

• 徐景贤 •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林彪机毁人亡八个月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我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公布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在信里，毛泽东袒露了自己的心迹，道出了对自己的评价，不赞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时也揭示了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初衷。使大家感到好奇的是：据周恩来在会上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烧毁了，现在发给与会者的文本是根据抄件翻印的，其中还有着颇为曲折的情节。信的内容摘录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

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衷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付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础（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写这封信时，身在武汉，而江青则在上海。之前的几个月，毛泽东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矛头直指北京市委。毛泽东先后在上海等地找陈伯达等人谈话，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五月，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会上批判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反党错误”，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的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林彪到会作了讲话，大谈政变，大事颂扬毛泽东。这就是那个使毛泽东“总感觉不安”的《五一八讲话》。

#### ◇ 林彪讲“政变”惊心动魄

那么，林彪讲话有哪些内容使毛泽东“感觉不安”呢？毛泽东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林彪的基本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林彪的这些观点，是和毛泽东一致的，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只是林彪在讲话中，系统列举政变的历史和事实，从古讲到今，从海外讲到海内，讲得赤裸裸、血淋淋，令

人感到惊心动魄，直接道破了毛泽东“打鬼”的本意，所以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毛泽东在信中还认同地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正因为毛和林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朋友们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当然，毛泽东也觉得林彪的有些提法“不妥”。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反复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最后，林彪宣布：“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 毛泽东向林彪的露骨吹捧妥协

对于林彪露骨的吹捧，毛泽东终于表态了：“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毛泽东又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尽管毛泽东有这么多“不同意见”，林彪还是照讲，而且在把林彪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全党这件事上，毛泽东又妥协了：“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有更加重大的任务：“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础（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就在毛泽东写给江青这封信后不到一个月，他回到北京，主持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四日，毛泽东指责向各单位派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刘少奇发出致命一击。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靠边站了，林彪的位置上升，仅次于毛泽东名列第二。

至此，这封信前后关联的脉络比较清楚了。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这封信公开发表的过程。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告诉我们，一九六六年七月江青收到毛泽东这封信后，感到十分重要，给周恩来看了，江周商量，觉得应把这封信给林彪看，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但指示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掉。当时林彪在大连，周恩来特地把信送往大连，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毁。但等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命丧大漠后，毛泽东却从他的档案里找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并决定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原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写完了这封信后，当即要随身秘书照抄一份，原件发出，抄件存档。为了使与会者相信信的真实性，周恩来特地把抄件复印后发给与会者过目，并带回去各自存档。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的人字迹很稚拙，抄在直条纸上，上面留有一两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周恩来并把抄件印成铅印本，发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形成了中央文件。在铅印印发时，江青要求把原信开头的称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经请示毛泽东，没有同意，只是在作为中央文件印发时加了个标题：“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后，每个人都要表态，发言都要上简报。我也在小组讨论时作了发言：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等等。其他人的发言，也都是这个基调。另外，也有人称颂江青的，例如邓颖超的发言，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月10月号

~~~~~

## 【历史疑云】

### 林彪命结“收妖”篇？

• 陈小雅 •

许多文革史研究者认为，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是解释文化大革命，解释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基本依据。在这封仅仅1700余字的信中，毛泽东两处提到“逼上梁山”。但它似乎又说明，文革完全是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的；他早就看穿了林彪，只是为了利用他打倒刘少奇，才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不仅如此，他还安排好这个“机关”，事后让“右派”出来收拾“左派”。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呢？许多“过来人”都不相信，但对于如何“破解”毛泽东的这个“谎言”又无从下手。1957年，毛泽东就干过“引蛇出洞”的勾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城府森严”的人，其内心有谁知道呢？不过，笔者以为，只要解决了这封信的“真实性”问题，答案便自然揭晓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自称是写于1966年，却发表于1972年。先是在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以后，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又有部份内容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1988年12月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曾经摘要引用过这封信。笔者于1996年——暨文革三十周年——曾撰文，对该信的写作时间提出了置疑（投稿《东方》、《读书》、《二十一世纪》未获刊登）。1998年1月，该信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全部收录，在其信末，鲜明地注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

——笔者当年的质疑未获刊登，可以理解，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件尚未解密，笔者的论述肯定是不充份的。但根据正式刊出的这一注解，我们可以肯定，这封信所述的内容，至少不是“历史原貌”。

但是，它的“不真实”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事后根据需要的“全盘伪造”，还是依据1966年确实存在的“蓝本”，在发表时作了修改？是主要内容基本真实，只是发表时装入了后来的思想，还是连思想也是真实的，只是当时没有那么透彻的表述？在此，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胡适的那句老话：请拿出“证据”来！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江在1966年4月曾有过一次见面，地点是在上海。信中所说的杭州会议是4月16日，北京会议是5月4日至26日。林彪讲话，时间在5月18日；印发林彪讲话的时间在此信之后的9月22日。毛泽东6月15日离开“武林”（即杭州）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正好是7月8日）——它们都发生在二人最近的一次见面之后。另外，信中的“本月”的“两次外宾接见”，一次是在7月12日，一次是在7月17日，在时间上也没有破绽，也是很随便就可以找到人证、物证的。（信全文见本刊zk9609b——编注）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以上细节的真实而放弃甄别，我们很可能就上了一个“精心炮制的骗局”的当了。中国有句古话：“远观其势，近观其质”。当我们在近处看不清一个事物时，我们可以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而正是这种“远观”告知我们，上述察访的“无破绽”，恰好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的东西：

其一，作为一封“随意性”很强的信件，它似乎“过于严密”了！仿佛是为了有意留供后人考证似的，他把那些公开的、可以通过别人获取的信息，尤其是几乎把党内高层大事数了个“滴水不漏”！这有违“家信”的常规。

其二，作为一封私人信件，它过于“政治化”、“公事化”了。其中个人的交流和建议，仅是作为“主题”的铺垫和装饰而存在。这就使信件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包装某种政治意图的“外壳”。

其三，信中表现的主人公心态是分裂的。他一会儿感叹自己被人“逼上梁山”，成为借助“打鬼”的“钟馗”，表现出无奈和窝囊；一会儿又表现出能洞穿历史的“英明”，不仅能作时间上的掐算，而且能预言一个“相克”的循环，甚至于预言“鹿死谁手”。他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我死了以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超越气概，另一方面又充满锱铢必较的自我“辩白”。如果我们相信这封信是同一历史时刻所著，那我们必会认为，此时的主人公若不是患有极度“躁郁症”，便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人格分裂”。但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绪嫁接起来作品，我们就能够对当事人给出一定的理解。

所以，“远观”的结论告诉我们，那种在短时间内、人性上表现出来的极度“反差”，显然不是上述“时间细节”上的“抛光”所能抹平的。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和协”的存在，它不能不使人猜测，那些所谓的自我解剖、那些表面的超脱，是否只是为了掩盖他真正想推销的一个“主题”而“虚晃一枪”？

然而，最可置疑之处还在于，这封隐藏着“党国最重大机密”的信，居然是写给到处“乱讲话”的江青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在毛泽东写给江青这封信的当时，这个“外壳”里并没有包裹多少“机密”，而当他装进这些“机密”时，他正巴不得利用江青这张嘴！

自毛泽东逝世以来，为粉碎与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外界曾流传不少关于毛江感情交恶的传言。通过与一些毛、江身边工作人员的接触，我们可以肯定，二者的关系，并不见得像传说的那样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会把这样一份涉及最重要部署的文件委托于江青。特别是信中所述许多毛泽东的感慨、心态，甚至少年抱负，如果放在一对感情融洽、无话不谈、交流频繁的夫妻那里，这应该是日常相处之间就已经交流完毕的内容，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一封信里讲那么多？这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毛江关系疏远，他们平时缺少交流，所以为日后在某个时段的集中“交流”留有素材。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毛泽东就不会把一份党国要件交由江青去保存；

要么，是毛江感情很好，毛泽东会把一切托付于她。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必“牛郎织女”般地“千里传天机”（这途中不是没有泄密的可能）；甚至于写不出如此“高度凝练”、以至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件。这是一个夫妻相处的常识。

除此之外，这封信还存在重大的“破绽”，以下仅举三例：

第一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预言：（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2）“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他是怎么悟到“七八年”这个循环数字的？

毛泽东此话并非无据可征，在1966年——也就是毛给江信之前，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6年文革，正好“七年”。但这样的例子——七八年——只有一次。按照思维的逻辑，只出现过一次的现象，在历史上只能被视为“偶然”，只有重复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才会被当作一种“规律”。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此信，或者此信中的这两句话，是后来所写（或添加进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众位读者可能会说，从1966年文革到1971年，只有5年呀。但按毛泽东说，刘少奇的问题是从“四清”运动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么，这里就出来了“6年”，还有一年呢？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的这封信，是1972年5月面世的。如果按照出版时编辑者的注解——作者在发表前作了修改，那么毛泽东在1972年想到这个“循环数字”，恰好符合逻辑！所以，如果相信逻辑的力量，我们可以猜测，毛泽东这封信（或信中的类似语句），是1972年的“出品”。

当然，上述毛泽东第一句话还有一个破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当时——也就是1966年7月，其实是文革“大乱”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八月”还在后面，毛泽东也自称是被“逼上梁山”了，能否“达到天下大治”，在当时根本还无法预期。所以，这句话无论如何都给人以“没有来由”之感。但如果说它出品在“913事件”——毛泽东自称“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之后，这句话就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意味。

第二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一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咒语：

“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这里便发生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何时开始想到“死”的？1966年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年，据说也是毛泽东一生最雄健、自负的时刻，那时，他甚至还“畅游长江”，何况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所以，把它放在1966年考量，只会让人觉得毛泽东“阴晴不定”、“性格乖戾”。但如果我们设想，它是“林彪事件”后那场大病的产物，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这里，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测不准”原理——仿佛他不能预见是否能在生前看到林彪的结局，但这种“正反反之”的手法，无非是为其他更重要的“英明预见”提供垫背帮衬而已。

第三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矛盾”的叙述：（1）“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2）“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1966年7月，右派还没打倒，怎么又跑出个“右派政变”呢？如果说，他这是指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但这句话中的那个“也”字是干什么用的呢？似乎是在他预言中的“右派政变”之前，已经有“左派政变”失败的例子在前。而真正“右派政变”的危险，不就在“林彪事件”之后吗？显然要“七八年”以后才可能有，所以，此信（或此段话）极有可能也是“七八年”之后的出品。

##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

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给江青的信作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二是毛泽东早期也确曾流露过对林彪的不安。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响？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夫妻串谋，演出一曲“三年早知道”。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是否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进行，也就值得怀疑了。如果这些质疑可以成立，那么，这出所谓“石碣收妖”的神话，不过是他欲挽救自己的名声而导演的一出现代“秀”罢了。

不过，虽然林彪把毛泽东“逼上梁山”是假，但毛泽东按照《水浒》“造反有理”的“道统”设计文革，却是千真万确的。在这场“革命现代样板戏”中，不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是他选中的演员而已。当然，这出戏得以成功上演，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被称为“红朝宰相”的周恩来。限于版面，这里就不作展开。

□ 本文为《毛泽东与〈水浒〉》一文的一节，2003年7月5日 于北京

~~~~~

### 【史实辨析】

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

• 张育明 •

先哲有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而中共自建党八十余年，建政五十余年，其根基就是欺诈和谎言，何以能存在至今呢？就是因为它所依靠的是暴力和恐怖。

岁月可以流逝，血和泪写的历史必然永存。尽管中共对舆论控制可谓天衣无缝，但人民成年累月涌流成河的血泪是掩盖不住的。就是透过中共将军元帅元老回忆录的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们是如何烧杀涂炭人民的。

我个人自从12岁（1940年）离开原籍河北省保定市郊的农村，到河南省的河北流亡小学和中学读书。1954年六年制医学本科毕业后经中央卫生部份配到河南医学院工作，虽然历经各个政治运动的坎坷生活，几乎没有离开过河南省，迄今我的94岁老母和我子孙仍然生活在开封市，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河南人民已经和我水乳交融在一起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第二号大头目就是死在河南省开封市，对刘少奇死前的最后27天，我还是知道可谓第一手资料的。就是刘少奇的骨灰，中共都可以造假，这一窝子造假的人能有什么是真的呢！？本文必然要涉及一些河南省地方官员的真名实姓，只要是实话实说，我只有请他们谅解了。作一个人首先要必须对历史对民族负责任，否则人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就在他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寿日子，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口谕，命令汪东兴送给刘少奇一个巨大的生日礼物：在囚禁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著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批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中央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

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这是一声落雷震撼在刘少奇头顶上，这是一闷棍打在刘少奇的天灵盖上！他浑身颤抖如筛糠，当时就大汗淋漓，呼吸急迫，嘴唇青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高至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升至40℃。但他一声不哼，只是睁大了一双乾枯的，快要绽裂充满红丝的眼睛，喷射出怒火！这就是刘少奇自1921年加入共产党这个黑社会邪教组织，助毛泽东为痞，为毛共作伥卖命近五十年所得到的报偿。从此，刘少奇完全明白过来了，直到死，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刘少奇完全清楚毛泽东共产党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五十年来他用这付药毒死了八千万无辜的中国人，使一两亿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延安抢救运动，解放后的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拔白旗，大小四清，甚至文化大革命，哪一场坑害中国人民的政治运动，不是他刘少奇助纣为虐，光凭毛泽东一个人能搞成吗？刘少奇咽下的不过是从毛共葫芦里倒出来原汁原味的药剂罢了。刘少奇这才明白了，共产党并不是把猴子变成人，而是把人退化成了双脚野兽。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总书记大头目们，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直到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贺龙，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有好下场的罕见。让一窝子蜈蚣，蝎子和毒蛇放在一个瓦罐里，那能安省吗！？共产党人就是如此！

一九八〇年二月，又一次中共中央全会，但是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是“党和人民”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决议中写到：“全会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一切罪名。”只有共产党的庙里又供奉著毛泽东，也供奉著刘少奇，不分是非，善恶和忠奸。可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岳飞庙里，只有跪在庙外的秦桧，伍员庙里也没有楚年王的座位。真不知道中共的有识之士如何对历史作个交代。

为刘少奇诊疗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里精选来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对象。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能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回来。因为专案组的军人护士太粗鲁，老是怀著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脚，不是医疗而是摔打。每次诊疗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存在可以救急用的血管。就在刘少奇生命垂危的当儿，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护士，年轻女护士拒绝参与，最后还是动员了两名周所熟悉的老护士去护理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要为九大留下活口让刘开完九大再死。据北京医院笔者所熟悉的医生传出，最后还是两位基督徒老护士，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又应付中央特派员，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救护刘少奇，最终还是把这两位老姐妹调开，刘少奇掉出两滴惜别的黄浊泪珠后很快就去世了。周恩来撤换了军队的医生、护士，换上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之后，刘少奇的病情稳定下来。他也感觉出来给他诊病护理的人，不再是那几个穿军装的凶鬼恶煞了，所以刘少奇死前一个阶段精神上还是深得安慰的！可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要刘少奇死，他把这几个地方医护人员一调走，又换上穿军衣的人，刘少奇在绝望中就撒手人寰了。

汪东兴受毛、周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行凶杀人或自杀，自从1968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病卧不起之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他身上的伤病痛极了时，只有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最后就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料瓶子，直到死，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握成亚葫芦，还仍然死死攥住手里！到1969年10月17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象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几丝丝气，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7点钟，汪东兴受毛、周指示，命令把刘少奇腥臭的皮包骨躯体扒个精光，被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放上了担架，塞进了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



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刘少奇监押在河南开封，只有刘建勋（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编注）一个人知道，就连接受医疗他的当地驻军155医院（原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医院）的军医护士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我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27天，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料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戴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不用说烈性传染病患者刘少奇骨灰没留下来，就是其他正常人的骨灰又有几份是真的呢？前年有个老朋友来我家看望我们，她的丈夫也是个老留美学者，右派教授，曾亲口对我们说：“现在国内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亲情，友谊，天地良心。都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抓钱！就是火葬场把尸体，留下骨灰盒，三天后来取骨灰。火葬场都是把尸体烘乾，然后用粉碎机打碎装成速肥粉袋，卖给养鸡场，养猪场，赚大钱！”我严肃地质问说：“这是真的吗？”她严肃地回答说：“当然是真的！要想取真骨灰，必须托人走后门，还要格外交大数目的小费！”她还表示：“虽然不敢说全国火葬场都是如此行事，但可也不少是这样办的！”

1978年底万里派出工作人员到河南省找刘少奇的骨灰，这时河南省的一般领导干部才知道他早在1969年11月中旬死在了开封市。当运载刘少奇尸体的六九型吉普车开进火葬场时，还有专人在那里喷洒消毒药水。当我问王怀忠院长，那么河南日报载文说：“火葬场一名老工人出于阶级感情，对刘主席的热爱，冒著生命危险，暗地里把刘少奇的骨灰私自藏起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王院长往四周一看，只有我和他的亲信，市中级法院办公室主任代哲（安徽人）在场，冷笑着说：“这就叫为政治服务！可以对现场分析一下，当时刘少奇同志头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遗体被白单子包起来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内，谁会知道那是刘少奇，任何人不准接触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是军人戴著口罩手套把他推进焚尸炉的！共产党宁可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敢违抗组织纪律，有谁胆敢私藏烈性传染病人的骨灰！有哪个觉悟的工人能隔著包裹的白布和塑料袋能认出一个死尸来？？这和亩产万斤粮一样，都是为党的政治需要服务！”（1969年11月14日焚化刘少奇遗体现场情况，可参阅汉子：《中南海人物沉浮内幕》中国大地出版社，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1993年版，62—103页；京夫子：《中南海恩仇录》第49页，《他死于政治谋杀》408—431页）。

中共连刘少奇的骨灰都能造假，还大睁两眼说谎脸都不红，全世界华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一群一窝说谎成性的人还能说几句真话，做几件真事呢？

□ 作者原河南医学院（现郑州大学）医生，美国耶鲁大学退休癌症研究员  
2003年7月25日定稿于康州家中

~~~~~

## 【亡灵祭坛】

寻找文革受难者

• 王友琴 •

金钟先生来信问我能否写一篇短文谈谈海外的文革研究状况。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在学术论文中，第一部份总该是前人工作的概况和述评。这样的格式确有道理。因为研究工作不是自唱自娱，是要经过一个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共同造成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尽管我自己做的文

革研究主要是在第一手资料的调查和分析，但我总是尽可能完全地阅读他人的有关著述。

## 1，把受难者纳入文革历史课

1996年我到香港科技大学参加文革二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12人，来自世界各地。我的参会论文是“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哈佛大学的历史和政治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先生，一位文雅而稳健的长者。他向我提出把我的文章印入他的文革课的读本里面。

我那篇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我和数百名文革经历者的谈话。文章描述了1966年红卫兵暴力的发生和过程以及所使用的暴力折磨的种种方式，列出了我的调查涉及的85所学校的名字和在这些学校中1966年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14名教育工作者的名字，还有被殴打折磨后自杀的人的名字。

那篇文章相当长。（见本刊zk9602a，即本通讯第一期——编注）用了小号字母和紧密的排列，仍然有22页标准打字纸。从1997年开始至今，这篇文章一直印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课程读本里。在哈佛大学选这门课的学生，1997年是379人。据说有时比这个数字更大。上课的方式是教授大课演讲和小班讨论结合。小班讨论由研究生助教领导，因为学生多，需要的助教也多，所以这门课的助教中还设有一名“助教长”，一个特别的衔头。

这一点很让中国的教授羡慕或者沮丧。因为这样的课也应该开在中国的大学里。但是，中国的学校至今没有这门课。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告诉我，他一直有兴趣在北大开文革课，但是只被允许给一些研究生小范围讲过一个学期，此后就再也没有可能。

麦克法夸尔教授写有《文革的起源》一书，那时候已经出版了前二卷，并且已经出版了中文译本，第三卷则刚刚完成。他和已故费正清教授一起，编辑和写了“剑桥中国史”的第15卷，即关于文革的《中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这本书在1991年出版。

我已经注意到，在这些关于文革历史的英文著述里，没有我文章里写的内容，即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和折磨。

西方学者住在中国之外，主要靠中国的出版物了解情况，而实际上，对普通人身受的暴力迫害，中国作者的书里一直写得很少。已经出版的三本中文文革通史中，只有严加其、高皋的《文革十年史》（1986）提到了两个普通人的受难者的名字。而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中，对1966年夏天的学校的描写仅仅是：

“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

这样的描写，把剃阴阳头当作是当时最严重的暴力攻击。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打伤的事情都避而不提。读这样的描述当然无法了解真相。中国作者这样写的原因可能很多，这里不做分析。这里要强调的是，当麦克法夸尔教授看到我所作的研究的时候，立即把我的文章纳入了他的课程内容。他原来不了解事实或者无法了解到事实，而一旦了解到了，他很快就把文革的群体性暴力迫害以及文革受难者纳入了文革历史课程的结构之中。

在这一方面，笔者感谢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支持。后来，当笔者遭到有些当年的害人者的威胁的时候，被有的学者质疑“写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给笔者来信说：你的研究有重大的意义，请坚持你追寻事实的方向。

## 2，删除受难者引起美化文革

探求文革事实，调查文革受难者的经历，这是我多年来努力做的工作。我和一千余人谈话，写出了几百名受难者的故事。在我看来，受难者的悲惨经历是关于文革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份。

从一般的逻辑和常识来讲，写一个“革命”的历史，不写革命的打击对象，根本就不可能是可信易懂的。同时，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道德评价，也完全离不开是否有受难者存在的事实。假如希特勒没有杀害那么多犹太人，斯大林没有枪毙那么多的所谓“反革命”，关于他们二人的描述和评价就会完全不同。

在文革历史这件事情上，非常明显的是：没有了受难者，文革罪恶与耻辱就很容易被消解，文革的历史也就很容易被浪漫化。下面是海外关于文革的理解的两个例子。

1996年，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以显著位置发表美国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的《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见下文——编注）。德里克认为，在过去十年“文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不断被抹黑”。他从三个方面肯定文革的意义。一是共产革命的新出发点，二是作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代表，第三是挑战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规范。

在西方世界支持文革的理论并非只是德里克一家。但是其他类似理论多半发生在文革时代，伴随着理论提出者对中国的很少的了解。在1996年还宣扬这种理论的人显然已经少了很多。因为文革后住在中国之外的人可以比以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实了。这种赞同性理论听起十分气势宏大。在德里克教授，是他以往看法和理论的继续。有一些年轻学者，觉得这些理论新奇而迷人。

但是，这些对文革持赞赏态度的人，他们对文革的事实，特别是对文革受害者的事实，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谈理论，却不愿意谈史实。显而易见，如果把中国在文革期间的社会实际状况，和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真做比较，肯定文革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他们的堂皇的理论不能解释事实，所以就不提事实。

到1990年代，已经没有理论家可以站出来说，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是应该的，也没有人能说斯大林处决“反革命”是对的，然而，对文革却可以说肯定甚至赞美的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文革受难者的事情绝大部分没有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受难者的被忽视，还帮助了那些文革的领导人洗白他们的历史。1996年4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对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整版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中最有势力的领导集团之一，曾经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四家并列发放各种命令。记者派曲克·泰勒（Patrick Tyler）在文中写道，王力住在北京的“很小”的公寓单元里，很贫困。王力在访谈中说：“我不后悔我在文革里所作的。”

1998年我偶然见到泰勒先生。我坦率告诉他，他的报导中说王力住的单元“很小”，是真的。如果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北京的公寓单元大都“很小”。王力实际上得到两个单元，其实比一般中国人仍然是有特权的，并不那么可怜。至于王力可以说不“后悔”，那是因为在那篇报导里，王力只谈了他们那个权力圈子里的冲突，他在那个冲突中失势而后来长期被关押，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就振振有词，把他自己说成是无辜的人，是可以“不后悔”的。但是，实际上，在他有权力的时候，北京和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被害死了，他一字不提。我的文件夹里就有

一些他在1966年的公众演讲，支持鼓励红卫兵的行动。那年夏天，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大批的人自杀，十万人被赶出家门。所有的学校里都在殴打折磨教育工作者，甚至包括幼儿园。火葬场尸体堆积，臭气扑鼻，来不及焚烧。“中央文革小组”还发放《简报》，列出多少人被打死，多少户被抄家，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样野蛮残酷的事情发生在已经有三千年文明的北京城里，可以对这样的事情说“不后悔”吗？

记得当时泰勒先生听了沉默良久，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担任驻北京记者，将往别国任职。

王力和比他职位更高的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都在香港出版了关于文革的回忆录。这些书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谈革命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惨死，更谈不上向被害人道歉。实际上，把人的痛苦和死亡删除了，就无从判断是非善恶。而且，这样的书暗含着如此价值标准：受难者原是像废品垃圾一样被丢弃的东西，不值一提。对生命的尊敬在这些书里被亵渎，所以一些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看这些书，觉得很不舒服。只是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机会对这些所谓“文革名人”发表他们的看法。

受难者不可能开口，幸存者无处讲话或者不敢讲话，历史学者没有记录受难者的名字和经历，害人者于是敢大声喧嚣“我不后悔”。

### 3，新闻界支持“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2000年春天，我在“亚洲研究年会”上见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强森·昂格(Jonathon Unger)。他是研究文革的专家。他的妻子陈佩华也是同道，著有《毛主席的孩子》一书，有中译本。他对我说：“对文革，我也做过采访，和很多人谈过话。但是，你写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对我的报告内容的惊讶也使我惊讶。我想，必须用比较大的声音来说出我的调查和研究。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办法公布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无法把他们的名字放入一座建筑物纪念馆中，也没有条件为他们印一本书。终于，在2000年10月，我在电脑网上建立一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把调查中找到的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经历，以及照片等等，陈列出来。网址是：[www.chinese-memorial.org](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网站建立以后，通过首页上的电子邮件地址，我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来信，称赞这个项目并且提供受难者的资料。不幸的是，在网上17个月以后，这个网站在2002年3月被北京当局封锁了。但是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仍然时时刻刻能展示文革罪恶造成的一个一个生命惨剧。

2001年，《国家评论》杂志的执行总编辑杰·挪林格(Jay Nordlinger)采访了我并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题目是“她从革命中看到了什么？”2002年，《高等教育报》的一位女记者贝丝·麦木奇(Seth McMurtrie)坚持要远道来看我并发表了一整版的专题报导“记录一个国家的疯狂：一个时代的故事”。2003年6月，在哈佛大学举行了纪念索尔仁尼琴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25周年的会议。索尔仁尼琴写过《古拉格群岛》等多部重要著作，揭示了苏联时代的迫害制度。杰·挪林格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漫长的道路从1978”的文章，在回顾索氏的伟大工作之后，他提到了我所作的文革研究的意义。我对新闻界的一系列不期而至的报导感到有些惊讶。我没有想到过这些素昧平生的记者有兴趣介绍我的工作。但是这些事情使我了解到一条：如果坚持追寻事实，是有人会的。

今年8月7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播出一个节目主持人杰若米·麦当奈(Jerome McDonnell)

和我的录音谈话。他和我谈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建立经过和我的灵感来源。谈话的最后一部份是他邀我讲一名受难者的故事。下面是我讲的故事的中文翻译：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1966年8月5日，一些十年级的红卫兵学生发起一个所谓“斗争会”，“斗争”卞仲耘和另外四名学校的负责人。他们五个人被指控为“反革命黑帮”。他们全都被强迫跪在地上“认罪”。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参加。有的红卫兵把墨汁倒在他们身上。有的用木棒打他们。有的拿开水烫他们。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卞仲耘昏倒在操场上。她被放在一辆垃圾车里。两个小时以后，她被送到马路对面的医院，被发现已经死亡多时。其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

卞仲耘被打死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他们都得到免费车票和免费食宿。在天安门城楼上，卞仲耘所在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把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衣袖上。问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之后，毛评论说：“要武嘛。”这个集会向全国实况广播。

由于毛的鼓励，对教师的暴力攻击迅速传播到全国每一个学校。卞仲耘的命运变成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命运。

为卞仲耘的死，她的丈夫和四个孩子甚至不能哭，因为那会被指控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以后，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为她设置了一个秘密的灵堂。他们把她的照片贴在衣柜里壁，在照片前供上一支花。衣柜的门总是紧闭的。除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衣柜里的灵堂存在。

两年以后，在另一轮迫害波中，在卞仲耘的学校里有三位教员在被“批斗”和关押后自杀。胡秀正是三人之一。她是化学老师，身后留下一个5岁的女儿。

文革以后，卞仲耘的家人建议在学校的墙上做一块牌子或者在校园里种一棵树纪念她。他们的建议被拒绝了。

此后卞仲耘的丈夫开始向法庭寻求正义。他试了9年而未能获得任何进展。法庭告诉他案子不成立，因为追溯期限已经过了。

在1993年，笔者来到卞仲耘的学校在她被打死的地方拍摄照片。三个12年级的学生好奇为什么我在那里。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说：“有个校长在这儿被学生打死？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讲完以后，我看到主持人和制作人以及他们的一个实习生助理，都非常难过的样子。录音室里是沉重的气氛。

事后，我告诉了两位中国人朋友这件事情。一个朋友说，那是因为美国人没听过什么悲惨故事，所以就会很难过。

另一个朋友说，不对。他们是新闻记者，他们是知道很多很多故事的。卞仲耘那样的故事就是令人难过的。有的文革经历者也许不会为这样的故事感动，那是因为他们的头脑被文革改造了，对受难者的遭遇习以为常，不以为需要记忆这些故事和为之感到难过。

其实，在对苦难的感受方面，在对历史的道德评价方面，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者学者和学者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并不在于是不是中国人，而在于价值观念以及思考方式。

卞仲耘的故事里提到的宋彬彬，在最近在美国制作发行的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发表她对文革的回忆和看法。看过电影的一个人说，这个电影对卞仲耘之死和红卫兵的角色描述和阐释，和我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所写的不一样。我还没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纪录片已经在香港演过。希望有人能具体指出不一样在何处，对错又在哪里。

#### 4，建立记录每一个受难者名字的理念

一个月以前，一位《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读者从哈佛大学来信说：“两个月前，两名犹太学生站在 WIDNER 图书馆前，用扩音器朗读二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连四、五天。正是对受难者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决心让罪行受到审判的不依不饶的努力，使犹太民族赢得了尊敬。”

去年，纪念“9 1 1”一周年的时候，在纽约的隆重的纪念仪式上，也念出了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曾经有中国作者著文，表示钦佩和羡慕这种朗读一个一个受难者名字的纪念方式。

这种列出每一个受难者名字的做法，是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的做法，也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国人也可以这样做。只是在这样做以前，需要先整理出一份受难者的名单。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是一个开始。希望有此意向者能合作努力，完成这个名单。

□ 原载香港《开放》2003年九月号

~~~~~

#### 【参考资料】

#### 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

• 德利克 (Arif Dirlik) •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性历史事件。这样形容它并不表示我们无视它在中国造成的许多惨剧，原宥它的荒唐暴行，或者全盘（或部份）接受它的经济、政治或文化政策。所谓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其定义几乎必然是指造成创伤的事件，其后果难以作非黑即白的评断，也未必能实现发动它的初衷，但却无可避免地把那些阻碍这股改变历史走向巨潮的人辗得粉碎。然而，我们必须把文革视为其历史环境中一些根深蒂固问题的表现，这个历史环境不独关乎中国当年的历史环境，还涉及与国内问题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际环境。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些历史环境中，世界各地人民迫切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他们对于文革燃起的希望深感共鸣。

说文革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或许并不新鲜。文革自开始直至1970年代末被中国官方否定之前，已被各方视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自此以后（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文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不断被抹黑，这段历史被贬为自相残杀的事件，或党领导人的风流帐，特别是毛泽东，他的形像由原来的革命导师沦为色欲狂。这样重写历史不但没有以批判态度正视文革提出的问题，反而企图以大事化小和道德谴责的手法抹掉对这场历史事件的记忆。（大家或已注意到，这正是文革中人们把对手从历史中剔除的一贯手法。）或许这并不值得大惊

小怪，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正在试图忘却两个世纪的革命史，不独中国如此，全球皆然。政治风气右转是革命史被抹掉的原因，中国的情况更有固执的东方主义在推波助澜。东方主义不承认中国社会是真正变动不居的，反而固守一种落后的文化心态，不断寻找证据支持在它眼中各种僵化的中国形像。像东方主义展现出的那种缺乏历史的社会，显然无法产生世界性历史事件。正因为出现这种历史被抹杀的情况，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文革的历史事件地位，这不但是为了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正视它，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我们的批判自觉，好让我们亦能以批判的态度正视那些因为抹掉革命历史而被束之高阁的现代问题。

以下的讨论，将集中在三个足以证明文革有资格成为首要历史事件的层面上：

（1）作为共产革命史的一个新出发点；（2）各新兴国家纷纷独立后，作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表现；（3）作为挑战公认的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规范而提出的社会思想。这些特点正是文革在进行的二十年（1956—1976）里，深受各地人民支持的原因。我不打算在此论述文革对中国国内造成的影响，因这方面我已有另文讨论。但我要提出一点：文革作为世界历史大事所带来的冲击，是与人们如何评价它对国内的影响有关的——这种看法和从前拥护文革、现在转而伐之的人的主张相反。当文革被视为影响世界的事件时，人们比较不注意它的不良后果。反之，现在这些不良后果被大肆渲染，或许不是因为出现了甚么新证明，而是因为文革从历史事件的位置滑落，遂令它的阴暗面浮上台面来。这点稍后再论。

#### ◇ 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有何意义？

文革是共产革命史上的首要大事。“文化革命”一词经过中国这一场变动而为人熟悉后，也可以套用在其他共产革命事件上，最显著的例子莫如1920年代末的苏联。这个词和它所带来的渴望包含着崇高的意义：如果社会主义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它就有两重明显的涵义：（1）新生产模式将产生有助它达成目标的新文化；（2）革命领导层应致力创造这种新文化，以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就上述两点来说，文革在逻辑上是紧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前提的：文化生活和生存的物质条件之间有着必然关系。新人类是新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

自文革以后，“文化革命”一词的涵盖面已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扩展至普遍的革命转化经验——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即把革命转化等同于由某一生产模式演变至另一生产模式。因此，“文化革命”被用作描述单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部演变所相应产生的文化转变、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转变、以及对于日常语言的态度转变。换言之，文化革命的理念除了指涉特定的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外，也开展了透视文化转变的新路向。

“文化革命”涵盖面扩大，或许证明了文革对知识界（甚至包括那些不再把这词汇视作历史事件的人）的影响，不过，回溯这个词在当时历史环境的具体意义仍是很重要的。文革凸显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三个需要确切说明的重要问题。第一，它挑战社会主义革命（和一般革命）在制度化后不免“非激进化”这一公认的想法。这种想法源自苏联（特别是史大林主义）的早期经验，指出一旦参与革命的一代凋零后，革命便会沦为例行公事和官僚作风，从而丧失其对抗权力迫切所需的乌托邦理想。当年文革正是驳斥这种思想的运动。这点不能和早期（如1920年代苏联）为社会主义创造合适新文化的做法混为一谈。虽然它和苏联的先例有着共同目标，但文革创造新文化所持的理想，在于竭力阻止革命“非激进化”。

第二，文革期间这一关注达到高峰，因为文革是对抗原来革命的另一场革命，这大大帮助了中国向全世界推广她的社会主义模式，用以抗衡原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为世人渴望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抗独裁社会主义提供答案。文革试图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它运用的方法空前激烈，因为塑造新人的目的，是要对付新政权本身颀硕的官僚主义。文革以打倒旧文化为目

标，但却以质疑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新“革命”文化为手段。由此看来，它的目标是真正革命性的，不只直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政体，也对抗社会主义统治集团。在各地人民厌恶官僚化的情况下，这目标获得各方回响，官僚化的特色似乎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中得到现代性。文革的反官僚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是促使新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重要因素，而新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摆脱早期共产主义的政治模式。

最后，文革把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文化与新生产模式（以及扩展至政治和生产模式）关系的新概念凸显出来。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假定新生产模式和新文化之间存在关联，但语焉不详，比如，到底是新生产模式创造新文化，还是文化领域中的独立性（autonomy）造就新生产模式。由于共产党内激进派（由毛泽东领导）不满1956年建立的新生产关系的文化影响不彰，遂决意把革命向前推进，他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把新一轮的革命活动锁定在文化领域。在此过程中，文化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用语），以使文化能够承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任。在这情况下，文化中被认可的独立性不管是来自中国固有历史遗产、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导的游击战革命遗产、或是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后果的理论（亦是此理论赋予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社会关系的物质转化无法自动产生新文化），都无关宏旨。结果很清楚：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角是文化转化，而不是社会主义转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独立性和经济或社会独立性的对抗，和1960年代全球发生的蜕变相共鸣，这点以下会再论述。在此只需说：与从经济或技术角度理解的生产模式的机械式转化相逆，它极为强调革命的政治和思想层面的重要性，这导出一种异于以往现代化假设（包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的行动方向。

如果光以文革和共产革命史的关系，并因此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斗争这种二次大战后的社会学观点来观照文革，那是不足够的，因为或许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中（即使在共产革命胜利后）的暧昧地位，赋予文革具体历史特质的。若以其社会主义革命史来看，她属于第二世界；但若以其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来看，她却又处于第三世界。有一点必须谨记，文革和第三世界独立是同时出现的，而在1970年代毛泽东受地缘政治启发而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之前，文革和殖民地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是相一致的，两者都以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式“社会帝国主义”为其根本。我认为农村式第三世界和都会式第一、二世界对比，无论对文革社会主义的新出发，或对其革命进程的思想主张都相当重要。

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必须被看为文革的重要文献之一（尤其是今天看来它似已不合时宜），因为它具体表现出新兴国家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敌意和对社会主义世界的热望，并和民族解放斗争（这到目前为止以中国最成功）思想相呼应。但它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革命论点（此为其理论基础）中找到思想依据并不重要，尽管它衍伸出有关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首见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推论是尚可商榷的；重要的是，林彪把中国革命（以农村夺取城市）的范式套用到世界各国上，并突出这种革命经验的基本意义：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对抗，是国际要关注的首要事项。它透露的讯息意味深长：在解决世界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农业社会问题；正若要解决某一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前，先要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经济问题。但这讯息却不幸被文章的敌意盖过了。

在此提出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向工业社会宣战，亦不是它对农业社会的强调，而是它表达出第三世界社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而得的授权（empowerment）意识。这一授权意识在形形色色的发展意见被提出时显而易见，却难在资本主义或苏式社会主义发展策略中找到。毛主义的发展范式也许是各种发展概念中最强有力的，它在新民族解放斗争中为新生政权寻求振兴经济力量时显著地表现出来。这种范式提出：（1）发展策略需以国家全面发展为出发点。（2）要实现前一点，就必须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delinking）。



第一个前提早见于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文章呼吁要注意全国“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矛盾。第二个前提则在文革年代强调自力更生、避免在物质或思想上依赖外国时已清楚表明。其分析假设是根据第一个前提的逻辑，它指出如果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不免以此世界体系的经济需求为依归，而忽视国内的经济需求。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毛主义”前提与中国革命渊源深厚。关于国内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早在1920年代已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关注。这些前提在1960年代再度被提出，对第三世界发展思想影响深远，在这方面，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亚敏（Samir Amin）的著述可谓其典范。

这个新发展范式除了结构上的意义外，最后还提出隐含深邃社会意义的实质问题，这与当前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社会的关注相呼应。像自力更生这种毛主义发展思想中心的口号，不但指出要避免依赖外援，也呼吁人民积极参与发展过程。这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早期发展（资本主义或苏联式社会主义）概念中群众被边缘化，针对这一情况，在自力更生的概念中，“人民”既是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发展的目标。按此路线构思的发展，不再由专家当家作主，而是以“人民”为发展过程的核心。要落实这套过程，必须把集体价值置于私人价值之上，因为合作和日常协商对达致社会目标是攸关重大的。政治上，这过程需要以日常原则来参与集体决策，为草根阶层通过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契机。劳动人民（即大多数人）亦要负责管理他们的生产活动。坚持自力更生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承认人民主体性和他们能够按照社会目标来管理自己的主体性。

“以政治为纲”（putting politics in command）这一自力更生的状况，意味公共价值优先于私人价值。能够绝对做到公优先于私的人，必须能从内心克服会导致个人主义的社会差别，不管是阶级和性别差别、劳动差别、专家和非专家的等级差别、以至最基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要塑造这样的人一方面要有恰当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转化和文化转化间存在对立，所以个人也必须致力达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因此，我们需要促进人民福利的社会机构，并确保人民忠于集体机构，但这又需要献身于恪守承诺而不会占这种机构便宜的人。最后的一种需要，不但解释了发起“文化革命”的原因，也解释了文革教育政策的方向。

文革结束后，这些政策在国内外均受到批评。对于文革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自然有其道理，但批评时必须慎重思考所持的论据。我认为最不相干的论据是认为文革妨碍促进现代化的教育，说它不相干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它评断文革政策所持的标准本身就是文革批评的对象。文革为了抗衡“世界银行”式教育（或为了成就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教育），提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想，以帮助建设它憧憬的美满社会。如果要指责这一种教育理想，不可能不先指责贯穿其中的社会理想，这当然与矛头指向文革的批评大大有关。若要以一种较不涉及意识形态成份的进路来研究这问题，则会使我们以违背文革的前提来判断其教育政策，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文革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想要达到美满生活必须有适当的学习和教育方式（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这可能为人们所忽略。

另一方面，专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把它模糊的（和庸俗的）社群和文化概念强加在社会上，在这种情况下，文革倡导的社群教育政策能否贯彻是另一回事。我想，这是普见于文革政策中的一种基本结构矛盾。不过，值得深思的是，虽然文革教育政策未能落实它们背后的社会构想，但却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毛后时代政策的成功作出贡献；即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塑造有才干的民众，解决地方问题并参与地方发展（这和大多数第三世界社会自上而下的文化处境大相逕庭，在第三世界，地方社会依赖集权中央的指导，而这些指导趋向迎合国际需要，而不是着眼于近在咫尺的内陆需求）。

在此，我要强调毛主义制度构想中一个受到经济效益观点批评、却对社会和政治组织仍然影响深远的层面，那就是坚持农业和工业结合，为的是要克服农业和工业（或乡村和城市社会）

间的结构分歧，这种分歧似乎是现代社会的特质。这是1958年惨痛的大跃进的制度改革之一，然而，一如毛主义发展思想的其他层面，其根源系于中国革命史。虽然共产党人寻求这种结合，是出于延安革命年代的需要，当时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实行自给自足，但这种构想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无政府主义著述中鼓吹的中国激进思想（受克鲁泡特金著述的启发）里。必须注意的是，在无政府主义著述中，工农业结合建立自给自足地方社群这一概念，和塑造全能（兼可胜任脑力和体力劳动，藉以消除劳动分工造成的阶级分歧）同出一辙。不用说，对于拒斥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首要目标是要避免在重新肯定社群的价值时出现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现象。当它被纳入毛主义的发展思想里，这些无政府主义理想也就和民族自治和发展的策略联系在一起。

即使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和社群对比，可能会告诉我们有关毛主义对社会的概念和它们所包含的矛盾。自力更生（这些制度革新可视为其体现）是一有多重意义的理念。它的目标不但是要藉自力更生来达到民族自治，还要做到社会各层面（下至地方）均能自治（这点在强调“比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经济学观点来是堪以为忧的），以使地方社会自力更生，无须依赖外援，文革时代以山西大寨的成就为表表者。然而党官僚集团大权在握，可依照它眼中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利益来调度资源，这就和自治社群的构想相悖。自力更生不但是一种达致民族经济自治的手段，也是建立社群的方法。它的乌托邦理想，吸引了那些本来对中国民族主义缺乏兴趣的人。

所有这些承诺都有缺陷，特别是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文革最终不仅没有将之消除，反而使之恶化，但这不是本文要处理的事情，我在此更关心的是这些毛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地人民有甚么吸引力。文革毛主义提出的发展范式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无怪乎文革产生了一套关于发展的新激进理论，这套理论为了落实参与发展和民主管理的理念，不惜牺牲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毋须惊讶文革为何能吸引那些原来没甚么理由会认同其革命目标的人，吸引那些从文革的社会成就中看到促进社会凝聚的新方式及落实社会目标的承诺的保守派。

#### ◇ 当代视野中的文革

在我提出以历史角度评价文革的当代框架之前，先要弄清我对文革的概念。若根据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官方对文革的时间划分是一历时三年（1966—1969）的事件；若按照毛后政权的官方观点，却是“十年动乱”（1966—1976）；我把文革理解为一历史事件所采纳的材料，则超越官方所划分的时间范围。这甚至可能提示出我在指向文革发展政策的革命根源，把文革变为整个中国革命的具体表现，这其实就是文革本身的主张。也许特别在后者上能看出，我赋予文革的历史意义不过是重复文革以往的主张而已。

我曾在另文解释过为甚么我认为以1956至1976这二十年为期来观照文革才算恰当，因此我不再赘言，仅想指出这种分期法旨在指出文革有其历史脉络，或者说1966—1969或1966—1976年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早在1956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后浮现的问题中已有迹可寻。但我认为文革最淋漓尽致地阐明了这些问题，并在全球凸显它们。正是透过文革对这些问题的阐明，毛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发挥遍及世界的影响力。

关于文革和整个中国革命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与文革派的主张相反，文革并非中国革命的极致表现，不是革命产生的唯一革命选择。在革命视野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有不只一个毛主义，而且文革宣扬的某些毛主义的意向，和中国革命初期同属毛泽东政策的其他意向相颉

顽。对毛泽东的接班人来说，文革显然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初衷。然而，从它倡导的政策中，文革表达出和中国革命史同样悠久的主题，有的甚至超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源。而文革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事件，是因为它以阐述这些主题来获得其意义和独一无二的特质，这点有商榷的余地。若失去了这些赋予它合理性的中国革命根源，文革充其量只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或统治者的过失。这也许说明了为甚么毛后时代领导层试图把文革和革命史截然分开，因为他们要在否定文革的同时，维护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相反，这亦是海内外中国反对派企图把文革和整个中国革命挂钩的原因，他们不但要质疑文革，并希望藉此动摇整个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我想在此指出，若要对文革进行真正具批判性的评价，就必须认识它的历史真实性，即认识它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意义，以及它随着这些历史环境变迁而变成一桩遥不可及的历史事件，只剩下各种恶行和压迫的记忆。但要批判地理解文革，毋需把对当代人有意义的记忆都抹掉。事实上，这样做不但妨碍了批判地理解文革的需要，也妨碍了批判理解过去和现在对于思考它的方法。对于文革蒙难者来说，要求他们以批判的态度思考它是太强人所难，但这只是当代人要完全贬低它的记忆的部分原因。在道德或政治层面谴责文革的大不乏人，过去二十年来他们沉湎一气，当中有曾参与文革、无论在思想和罪行上都脱不了关系的中国人、忘掉了自己曾经多么醉心文革的外国人，还有许多人把这历史弄得俗耐不堪，以作为风行世界市场的商品。意识形态和消费式揭秘心态的诡异结合，使得任何对这事件稍有见识的论述均欲说无从，遑论有批判的见识的著述。

我不想在此分析过去二十年关于文革文献的转变（不管它如何重要），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为甚么二十年之前曾被激进派、保守派都视为革命（和发展）成就范式、为之喝采的文革，现在竟受到如此指责和贬斥，无法为当代提供启示？我故意给这问题以抽象和思辨性的答案，盼能抛砖引玉，激发更多有关历史记忆的讨论，但这答案也作出承诺，把有关中国革命的批评从现今遭知识界贬斥而湮没的境况中挽救出来。

今天文革似乎已无关重要，那是因为它针对的问题已无甚意义。这点在前文论述它关注的首两件事情中显而易见。当年文革出现的意义重大，它对抗无可避免的“非激进化过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或一般革命）史上的突破。当今天社会主义和整个革命政治理念都被丢到过去，革命政治的突破就变得不口边际，更遑论其历史意义。关于文革作为第三世界政治复兴的体现也大抵相同。在1960年代文革的历史环境中，第三世界理念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举足轻重。今天，第三世界已谈不上是一完整理念，更不用说是甚么承诺，提出以革命的第三世界方案替代公认的发展范式已无可取之处。第三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正急于为自己披上第一世界的外衣（与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主张相反，现在已没有第二世界可言了）；尚未进入发展中经济国家之林的第三世界社会，现已弄得乌烟瘴气，显然不靠外国援助就难以求存。

上述转变并非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而是国际关系转变的结果。我曾在另文说过，我们所知的整部社会主义史，无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须透过它们与资本主义内在演变的关系来理解。殖民主义（以及针对它而出现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阶段的产物（尤其在第三世界）。虽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仍然屹立不倒，但当代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世界关系，已跟从前产生第三世界或试图牵制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管它叫世界资本主义、晚近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弹性生产或积累）的出现，使早期世界关系的概念和由此得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变得与现实脱节。或许欧美跨国企业仍然主宰世界经济，但他们当中加入了原属于第三世界的新成员。或许宰制世界的大国仍然存在，但当民族国家的许多势力（包括人员和文化上）已被跨国企业所取代，如今再大谈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已不比以往能那么理直气壮了。而在此中最重要的是，以往着眼于国内市场的发展范式，已被重视出口、发展跨国经济的范式所取代，侈谈民族经济自治已无甚意义。以前与资本的经济运作密不可分的民族国家，现在却被视为这种运作的障碍而受到抨击。资本仍然主宰一切，但已被置于一个不同的

系统下，这系统追求包容而非排斥。

这些资本主义内的结构演变将产生它们自己的“文化革命”，这就是本文题为“两个文革”的原因。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哈维（David Harvey）等理论家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要求和生产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信手拈来以“后现代主义”一词概括之。这是另一场文化革命——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巧和中国文革同时发生，尽管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它的恒久意义。现在来做个事后诸葛亮，回首前事倒也饶有趣味。正值文革爆发、高唱其发展政策之际，台湾和南韩分别在高雄和马山设立出口区。或许当年批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激进派没有想到，拥有发展前景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但事实却是如此。而且在这些以出口区为代表的出口型经济体系蓬勃发展之前，提倡经济发展的民族自治的呼声已销声匿迹。不消说，这些经济特区之所以成功，归根究底是仰赖日新月异的科技，使生产活动得以跨国进行。也正是这些科技使资本主义中的新文化革命得以成功，其核心是它选择充当影像和资讯生产者，而非商品生产者（商品仍需要生产，不过是在第三世界地区，第一世界则担任设计世界的“智囊团”）。资本主义“文化革命”在思想层面生产的正是文化本身，而不是以生产文化为手段来达到其他目的，比如社群。

以这种观点看，中国文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原来针对的那个造成各种问题的世界，已逐渐被另一个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力量主宰的世界所取代，不管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的批评者，对于出现这种情况都始料不及。文革是对抗帝国主义或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产物，它针对的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当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已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关系时，这些问题也就显得无关重要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间的矛盾，在它们被道出之时已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概念中，这些概念自其时起便证明在包容矛盾方面有极大能力；因此，当激进派仍在为如何适当对应资本主义的过时概念争论不休时，商界已能运用毛主义策略来制定市场计划。

不管是思想失败也好，实践失败也罢，文革期间出现的毛主义的消亡，不光因为它是一种失败的革命思想，更因为推陈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和当初产生毛主义时大相迳庭，使毛主义日渐脱离现实。文革毛主义今非昔比，不再被视为对未来的解答，而只是过去的苟延残喘，被现代世界超越而变得毫不相干。

文革——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文革挪用的革命毛主义——对现代有没有启示？我认为有。今天背弃毛主义对现代性的选择，是整个扬弃以激进选择替代资本主义趋势的一部份。我们不要忘记，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的内部演变，使得早期社会主义针对其宰制地位所提出的挑战丧失意义，但资本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它的这些演变又制造了（并仍然继续制造）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自有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即存在，有些是由资本主义的新生产和组织方式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当下作为它们的出发点，但这并非说过去对于当下没有启示作用，重拾早期的革命挑战是克服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不可或缺的。但过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毛主义对于社会的革命性构想（前述毛主义提出的关于地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尤其可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

近几年世界各地的激进活动纷纷转向，从原来强调民族国家转而着重地方运动。激进活动转向的原因之一，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解决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叫人理想破灭，然而，这一理想破灭本身却是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对国家丧失信心的其中一环。尽管民族国家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已经消亡，但在过去二十年来，各国急于摆脱以往为造福人民而肩负的责任。除此以外，国家与跨国资本主义的勾结日见露骨，国家再度毫不忌讳地充当资本利益的促进者，有时候还把它们自称代表的民众利益置诸不顾。各地的国家“私有化”过程程度不一，视乎民众的抗拒能力而定，这种私有化代表一种世界大势，冲击着以往民族国家捍卫公

域抑制私利的概念。这同样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产物。在此意义下，社会主义国家自1980年代末期的没落（破私立公的最极端形式），可视为世界进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部份。

以往，国家在跨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地方社会需求之间，扮演中介斡旋的角色，而“公共国家”（public state）衰落的其中一个副产品，就是上述功能的削弱；因此地方社群要比以往更直接地面对世界经济的需索。换言之，近年来地方社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单是因为对国家或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所致，还因为跨国资本的运作打破了地方社会原来闭关自守的状态，利用它们来达致目的，而当这些地方社会再无利用价值时就弃若敝屣。正是这种资本运作塑造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地方面貌。地方社会必须自求多福，摆脱对国家的依赖，方为对应之道。这对于孕育地方运动是相当重要的。

我不是说地方运动全然专注地方事务就能成事。要有效抗衡资本的世界力量，地方运动就必须缔结跨地方联盟（不只是在国内，而是跨国界地进行）；身处世界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许任何一地（比如美国或中国）工人的福祉都要比以往更息息相关。但是，面对新的形势，要釜底抽薪地保障人民的福祉，就必须以地方为出发点。

我想这就是以毛主义形像呈现的中国革命记忆最能提供给当代的启示。如前所述，文革时期的毛主义把地方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它是源于中国革命史上更早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构想，后者把地方和国家脱钩，并认为地方社会的首要工作是摆脱和反对民族国家。因为毛主义着重地方社会程度的“自力更生”，故包含了地方自治的理想。它的产物众所周知。特别重要的是在地方社会层次实现工农业结合制度化，为毛泽东时代以及毛后时代的中国创造独特的社会布局，这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与其他早期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在向资本主义世界系统开放之时，能制衡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的力量。这种社会布局的成功实有赖于革命时代的经验，虽然它或会制造腐败和滥权的条件，这在今天叫人忧心忡忡，但它也培养自力更生、集体活动和地方政治领导和民众间紧密合作等习惯。

虽然北京当局仍握有控驭力，并迅速把中国社会圆满发展的功劳往身上揽，但这些成就其实主要应归功于地方社会自求多福的能力，这点耐人寻味。若把北京共产政权和中国地方社会孤立起来看固然不妥当，但作一个分析性的区别亦不无助益，我们可藉此看到中国两个相冲突的发展范式。一个是以政府为核心，保障共产政权和它栽培的新生管理阶层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占据要津，但它除了造就极权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就无甚裨益。另一个范式则建基于地方社会之上，承接早期地方发展以人民福祉为先、国力为次，并指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遗产。后者在政治上激进之处还在于，尽管它明显不是排斥国家，但要求重拟国家的领土范围（体现于新地方分权主义的主张）和势力范围。换言之，它提出重新思考国家的界限和责任，对抗现政权界定的国家权限并以此为其合法性的主张。

由于现政权倾向采纳它的革命遗产，而舍弃其反革命极权倾向，换句话说，中国社会不但继续提供一种挑战资本主义霸权的现代性的不同选择，而且亦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格局制造的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法。也许毛主义构想的遗产在中国最显而易见，但在世界各地的地方运动中也可见其踪影。在第三世界地区（从印度到恰帕斯），自力更生的主张巩固地方社群、抵抗资本肆虐；除此以外，它在第一世界社会里唤起人们记忆中生气焕发的社群，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虚幻社群”（virtual community）分庭抗礼。

或许文革未必称得上是唯一（甚至最忠实）根源于中国革命史的毛主义构想的代表，但它有声有色地向世人展现了这种构想的力量，将萦绕往后好几代人的记忆，这足以证明它堪称世界历史事件。然而，它不只是一朦胧的记忆而已。我们可能会试图把它的记忆驱散，但它是挥

之不去的，因为在历史现实中，它回答的问题是我们遗产的一部份。不论喜欢与否，每当我们  
要解决这些问题时，它就与我们同在。

□ 林立伟译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